

新视界媒介研究丛书

DIANSHI GONGGONG
LINGYU
DE JIEGOU ZHUANXING

电视公共领域 的结构转型

胡明川◎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新视界媒介研究丛书

电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胡明川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电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 胡明川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1

(新视界媒介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3-2797-2

I. ①电… II. ①胡… III. ①谈话—电视节目—研究
IV. ①G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3954 号

新视界媒介研究丛书
电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胡明川 著

责任编辑	罗爱林
助理编辑	罗小红
特邀编辑	颜菊思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5 mm × 230 mm
印 张	13.2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2797-2
定 价	33.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总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播学研究在我国正式起步，但长期以来，仍然是以新闻学为主导，传播学研究主要还停留于基本知识的译介，并与新闻学进行融合交叉，传播学自身的理论、方法没有得到应用和发展，具有创新性的研究也不多。直到20世纪末，媒介形态发生巨大变化，新媒体不断涌现，对传播学以及传统新闻学产生了巨大冲击，提出了全新挑战，学者们研究媒介的视角开始多元化，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在这些研究中有了更好的运用和发展。至近十年来，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已经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传统理工学科为主的院校——西南交通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从无到有，得到了快速发展。西南交通大学自2003年开始招收传播学本科专业以来，发展极为迅速。2004年新增广告学本科专业，2006年获传播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2010年获新闻传播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学科拥有一支具有学术活力和科研潜质的中青年队伍，在传播学学术研究领域逐渐崭露头角。迄今为止，已经获得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4项，省级课题若干项。这套《新视界媒介研究丛书》可以说汇集了西南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

从这些作者来看，都具有相关领域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多年从事专业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而本套丛书又是他们最新研究的结晶。从这些著作的选题来看，研究问题已经向纵深方向和学科交叉领域扩展。《电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关注电视公共领域，通过梳理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理论的发展脉络，以《面对面》为个案，从公共性话题、记者提问、访谈对象回答、双方在子话题上的博弈、受众的不在场对话等多个方面展开了实证分析，尝试建立电视公共领域中记者与访谈对象的在场式对话、节目与受众之间的不在场式对话的言语行为分类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电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特点。

《现代世界的神话——中西广告原型比较》则采用原型理论研究广告，揭示原型理论如何在中西方广告中运用，同时挖掘出广告背后的深层力量，为今后广告主和广告制作者选择形象、运用原型意义设计形象提供参考依据；通过中西方广告原型的比较，探究文化差异对广告传播的影响，不同文化背景下原型表现方式的异同以及国外广告原型的中国适用性等问题。

《幻想与真相：网络游戏的文化建构》聚焦于传播研究关注不同的网络游戏。该书运用内容分析、符号学等方法，深入网络游戏文本内部考查其文化建构机制，认为网络游戏是文化建构的结果，其本质是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网络游戏借助网络媒介的虚拟性、互动性和开放性，发挥游戏文化的自由性、平等性和愉悦性，设置了一整套包括美名、危机—拯救主题、英雄、美女、地位、财富、情感、荣誉在内的复合体系，建构了一个可供游戏者娱乐休闲、人际互动、自我实现或逃避现实的虚拟空间。作者认为网络游戏的迅猛发展也说明了游戏开发者和消费者在文化建构上的契合，反映出游戏者的思想、情感和欲望，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大众的共同需求。

《选题策划学》对图书选题策划进行了多学科、分类别的详尽解析，其特点，一是理论视角“全”，除了以编辑学、出版学理论贯穿全书外，还把创造学、心理学、营销学、管理学等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二是研究领域“新”，除广泛吸收出版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把电子出版、网络出版、手机出版等新媒体的选题策划也纳入研究视野；三是分析方法“细”，除按国际惯例，将图书按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少儿出版、学术出版分为四大门类，还根据中国出版业的实际情况，增加了古籍出版，基于各自的不同特征，分类论述选题策划、内容策划和形式策划的原则、方法。

《审美文化视域下的网络艺术研究》关注网络艺术，从审美文化的研究视角，在对网络艺术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学全面的界定和分类基础上，将网络艺术放置在整个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下，着力探讨其所体现的“虚拟审美”现象与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艺术本质与信息科学的内在联系，在积极发掘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科学观在网络时代的美学价值的同时，将中国古典美学的“和谐”理论引入网络艺术研究，揭示了网络艺术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方向。最后在回顾网络艺术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创建网络艺术生态圈的构想，为网络艺术的未来指出一条可行之路。

《好莱坞电影人物形象考》别开生面地考察好莱坞电影人物形象塑造及其历史演变。该书深入解析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类型人物塑造及其与电影叙事的关系，厘清了视觉奇观化带来的对当代电影认识的某些误差；通过类型人物成长史的分析 and 解读折射美国电影发展的大致历史进程及背后的社会及文化变迁。

《传播心理研究导论》以传播学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作为研究对象，在梳理心理学对于传播学的贡献和影响的基础上，综述了传播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资源，对媒介使用与媒介依赖、社会现实与媒介呈现、传播说服、媒介暴力与性内容、媒介与亲社会行为、流言传播心理以及媒介素养与传播心理等专题展开了深入论述。

《中国式类型片的类型分析》对中国式类型片进行类型分析和学理交叉探讨，通过梳理其类型发展史与学术研究史，探讨其叙事法则、民族风格、文化内涵以及时代转型，并与好莱坞类型模式进行比较，试图建构中国电影类型理论。

以上这八本著作只是本系列研究丛书的第一批，希望这些著作的出版，能对西南交通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科研创新能力有良好的促进，并进一步扩大我校新闻传播学科的影响力，后续我们将适时推出更新的研究成果。

目 录

第一章 公共领域、电视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	1
第一节 公共领域理论	2
第二节 交往行为理论	15
第三节 电视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	22
第二章 电视公共领域中的公共性话题	33
第一节 《面对面》访谈对象偏向	33
第二节 《面对面》节目主题分析	50
第三节 《面对面》偏向：上层、传奇	62
第三章 电视公共领域中的记者提问行为	74
第一节 5W 模式	77
第二节 状况模式	78
第三节 理解模式	87
第四节 意见模式	95
第四章 电视公共领域中的访谈对象回答行为	106
第一节 接受式回答	107
第二节 协商式回答	108
第三节 对抗式回答	120
第五章 电视公共领域中对话者的博弈行为	126
第一节 提出子话题的常见提问类型	128
第二节 不同类型节目子话题的敞开与遮蔽	133
第六章 电视公共领域中受众的不在场对话	142
第一节 接受、对抗、协商之比：7：2：1	144
第二节 简单意见、论辩说理、补充事实之比：7：2：1	147
第三节 缺乏能激起评论兴趣的公共性话题	156
第四节 《易中天》的网络评论分析	161

第七章 电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183
第一节 对话形式：在场与不在场对话的断片式接续	184
第二节 对话空间：从地区公共领域扩展到国际公共领域	186
第三节 对话者：代表型与大众型公共领域的交叉渗透	190
第四节 对话机制：议程设置上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	193
参考文献	199



第一章 公共领域、电视公共领域与交往行为

“我们的知识具有一种命题结构：意见可以用陈述的形式准确地表达出来。”^①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实质上是一种公共舆论领域或公共政治领域。公民通过言语沟通的交往行为，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其他公民对具有公共性的话题进行基于交往理性的对话，互通信息、互相理解和互相影响，形成某种公共舆论或共识，对抗公共权力机关的权力意志，或者说，对抗系统的工具—技术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侵蚀，以获得解放利益。

哈贝马斯 1962 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用社会历史分析法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结构和功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虽然该书 1990 年英文版序言中说他近些年已不再关注公共领域。但是，他分别于 1981 年、1984 年出版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一、二卷，对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的论述，却可以看作是对公共领域理论的深化：研究公共领域中的公民意见表达与交流沟通行为的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问题。^②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公共领域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下文将对其理论发展做一个学理上的梳理。

①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 页。

② 在 1989 年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的研讨会上，哈贝马斯第一次公开声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其思想体系的“入口”，是他进入学术公共天地，建立自己学术空间和理论立场的开山之作，更是其交往行动理论的萌芽。转引自牟平清《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载《甘肃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另外，在景天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和交往行动的回答》(<http://old.blog.edu.cn/user1/19864/archives/2005/231858.shtml>)中，也有公共领域和交往行动理论之间关系的问答：“问（3）：能否扼要指出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到《交往行动理论》之间的逻辑线索？答：对于这种联系，在我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 年以来的新版本所写的导言中，已经做过解释。《交往行动理论》吸收了其前的早期历史研究的结果，而某种特定类型的交往——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互动——如今是被作为日常生活中社会整合的某种一般性机制来分析的。”



第一节 公共领域理论

一、关于公共领域及媒介效果的早期论述

(一) 关于公共领域的早期论述

古代雅典就出现了公民集会代替同族人的集会。同族人的集会是同一族成员聚集在一起谈论部族所关心的事。公民集会则并不是以同族为条件，而是以涉及共同事务和利益的公民为前提条件，公民成员可能谈论任何有关城邦的事。尽管参与的公民必须是有知名家族背景的男人、族长、战士以及其他劳工（通常是奴隶）的主人，把奴隶和女人们排除在外，是在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公民共同体，但仍具有了公民在平等条件下进行决策的特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学》里分析到：“公民共同体是一个言论代替血腥、决策行动代替复仇行动的地方……公民既统治，又被统治。公民一起作出决策，在那里每个决策者都尊重其他人的权威，所有参加者都服从他们已作出的决策（现在被理解为‘法律’）。”^①

亚里士多德之后，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都对公民共和传统进行了论述。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公民理论尤为引人注目。“她虽然同卢梭一样对古典小城邦共和政治深表赞赏，但和卢梭不同，她强调的是多元而非‘普遍意志’。多元允许每个公民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表述对集体事务的看法，而‘普遍意志’则强调行为一体的公民们必须在集体意志中求得统一。和马基雅维利一样，阿伦特注重‘政治美德’，如激励政治参与所必须的勇气、荣誉感和公众精神。然而，和马基雅维利不一样的是，她并不认为军事训练或征服是培育这些美德的途径。她把一切暴力视为‘前政治现象’，因为暴力是无声的。她重申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强调人和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能运用语言去说服别人，人不像动物那样只能依靠自然的关系形成群体，人可以超越自然维系而形成政治的联系和群体，人的这种能力便是语言所赋予的。”^②

① J·G·A·波考克：《古典时期以降的公民理想》，吴冠军译，刘擎校，知识分子论丛之二《共和、社群与公民》，<http://www.philosophydoor.com/Article/politics/1105.html>。

② 徐贲：《阿伦特公民观述评》，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2月号，<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4941>。



阿伦特重点论述了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的性质及其参与者身份（公民）。阿伦特认为，显露性和人为性是公共领域最重要的特征。“我们认为，显现的——那些别人和我们自己都能眼见耳闻的——才是真正现实的……每当我们（公开）谈论只能在（自己的）隐私和内心才能感受到的东西时，我们就已经把它带到了——一个它可以获得显露性的领域。只有在显见的公共领域中，人的经验才可以分享，人的行为才可能经受公开评价，人的角色才得以向他人展示。”^①“公共领域的人为性指的是，公民们共有的‘世界’是相对于任何形式的‘自然’或自然人际关系（部落、种族、民族等等）而言的……公共领域最重要的活动——政治，不是人类自然生活的延伸。政治对人的生存意义，不在于它反映或体现人的天性或自然禀性。正相反，政治是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地地道道的文明成就。政治使得人的个体能超越自然生活的束缚，形成一个能允许自由和创制性行为和话语的共同世界。”^②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显露性和人为性的论述，使人们重视公共领域的人为参与的文明性质，显示了其需要呵护珍惜才能继续存在的特点。阿伦特所论述的公共领域，既不是自然化了的“社群”或“民族”，也不是以宗教、职业、性别、好恶等社会属性来识别的“社会”，而是在政治平等的前提下，同时强调个人展现自我和人人参与的公共话语场所。阿伦特认为，“每个社会成员只有行使了公民责任和义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个人只有在自由、民主的体制中方能真正行使公民职能，从事公民行为”。^③而且，“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直接牵涉到公民的能力，也牵涉到民主社会的实际成效”。^④因此，福斯（Peter Fuss）指出，“阿伦特的公民参与观重在公民制创性的两大因素：实质和程序。从实质上看，当一个公民就是把握自己的制创性，这是一种‘个人发起，众人讨论’的制创性。从程序上看，相互说服或适应，要求一种尽量能保护这种制创性的非强制的决策过程”。^⑤

（二）媒介效果研究中早期的批判理论

从一开始学者们就极为关注对媒介效果的研究。美国经验学派主要运用实证方法对媒介效果进行行政研究。与之相对，欧洲的批判学派主要运用理性思辨的方式对媒介效果进行文化批判。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6）探讨照相复制技术、电影复制技术对艺术作品造成的影响，提出复制技术造成了艺术作品光韵的消失，艺术的膜拜价值降低，迅速滑向艺术品价值另一极——展

① ② ③ ④ ⑤ 徐贲：《阿伦特公民观述评》，载《二十一世纪》2002年2月号，<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4941>。



示价值。由此，凝神关注让位给消遣性的观赏，美的艺术开始向后审美艺术转变。不过，在惋惜艺术品光韵消失的同时，本雅明对艺术品在复制时代可以给大众在艺术品拥有和欣赏上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进步表示了乐观的态度：“它那‘世间万物皆平等的意识’增强到了这般地步，以致它甚至用复制方法从独一无二的物体中去提取这种感觉。”^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道尔诺（Theodor W. Adorno）却在《启蒙辩证法》（1947）的专章《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中，对电子传媒技术复制世界的社会影响持悲观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大众传媒的复制技术，扩大了语言的巫术效果，在资本逐利的动机下，人们被分门别类地对待、被有针对性地制造、被意识形态别有用心地操纵，被愚弄后又被轻视地骂成大众。大众传媒协助制造了一个不受质疑的、“自然的”、看似风格多样、其实单调雷同的系统。“电影、广播和杂志制造了一个系统。不仅各个部分之间能够取得一致，各个部分在整体上也能够取得一致。”^②这种系统之所以有效，与大众传播一对多的信息传播特征是密切相联的：“电话和广播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飞跃。电话还依然可以使每个人成为一个主体，使每个主体成为自由的主体。而广播则完全是民主的：它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了听众，使所有听众都被迫去收听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③在所有人只能接受别人复制的外界信息而变成哑巴的社会里，“文化工业驳斥了对它以及对它所复制的世界的所有责难……新的意识形态就把这个世界本身当成了对象。正是通过将混乱的生存状态提升为事实的世界，并把它一丝不苟地表现出来，它利用了人们对事实的崇拜。这种转变使生存本身变成了意义和权利的替代品……电影的功用还在于，它可以在最近一段时期里，让系统本身制造出构成系统的生活，而不是使这种生活即刻消失掉，从而使系统成为可信的，并为其提供意义和价值。只要人们不断投入到系统中去，就会为系统的盲目存在进行辩护，甚至为系统固定不变的性质进行辩护。任何能够自身重复的东西，都是健全的东西，自然循环和生产循环即是如此。各种杂志上永远都是咧着嘴笑的美人，爵士乐也永远吹奏个不停。”^④而系统却在进行着各种操纵媒介宣传效果的技术开发，成为专门制造人的程序：“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同样的事物，对同一个文化产品的机械重复，与宣传口号的机械重复是一模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有效性的需求使技术发展成为一门心理技术，一个专门用来

① [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1 页。

② ③ ④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107 页、第 108-109 页、第 133-134 页。



制造人的程序。”^①有利于系统维持的相同意识形态的人们，被大众传媒批量化、标准化地制造出来。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信息（语言）已经在现代性的发展中被巫术化。“如果说在理性化以前，词语产生了谎言和渴望，那么现在，在理性化以后，词语进一步约束的则是渴望而不是谎言。实证主义把世界还原成又哑又盲的数据，然后把它们转化成语言本身，限制用语言去记录那些数据。同样，术语本身也变得无法理解了；它们获得了一种惊人的力量，一种附和和厌恶的力量，这样，它们便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巫术……一般而言，巫术最容易附着在名字上，名字也能够产生一种化学反应：变成一种变化无常的、可以操作的指涉，它的效果也是可以计算的，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与远古时期的名字一样，会同样变得横行霸道。”^②当具有巫术效果的词语通过大众传媒而广泛传播开来，其巫术般的效果更令人震惊。“美国人用‘风靡一时’来表示像流行病一样出现的时尚——高度集中的经济实力加剧了这种狂潮，这说明，那些把广告业务统揽在自己手中的老板们，早就在文化领域里渲染这种现象了。总有一天，当德国法西斯决定用高音喇叭开始说‘无法忍受’的时候，第二天，整个国家也都会异口同声地跟着说‘无法忍受’。同样，在‘闪电战’中，受到德国重炮袭击的国家，也把这种说法写在了自己的标语中。统治者采取的措施就是，不断重复这些名词，让人们尽快熟悉它们，就像在自由市场里，如果每个人嘴边都经常挂着产品的品牌，产品就会销量大增一样。为词语注入特定的指涉，将它们盲目而又迅速地传播开来，这种做法完全可以把广告同极权口号联系起来。为演说者编造词汇的经验层次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迅速调动语汇的过程中，语言必须是冷冰冰的，直到现在，我们也只有在广告牌或报纸的广告栏里，才能找到这种冷冰冰的语言。无数的人在使用他们无法理解或运用的词语和表达，因为这些词语和表达能够引起他们的条件反射；从这种意义上说，词语就是商标，人们越是与词语所指涉的事物之间形成稳固的联系，也就越难以掌握它们的语言意义。”^③从而，“不论在什么地方，对意识形态的自由选择也就变成了选择同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④

哈贝马斯受到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关于文化工业的悲观论述的影响，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大众传媒的“别回嘴”特点，被利益集团利用来形成难以被公众批判的伪共识，再度拥有了像宫廷贵族那样发着灵光的、超自然的形象，从而使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走向了重新封建化。不过，哈贝马斯

① ② ③ ④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48页、第149页、第150页、第151页。



在后期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主要从主体间进行有效的语言交往如何可能进行了思考。他提出，在满足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可理解性四个有效性声言的条件下，才能够进行有效的语言交往行为，达到主体间的信息交流和相互理解。同时，他还对保证语言交往行为能够更好地进行的外部条件，即理想的言说情境进行了描述。这样，哈贝马斯就从逻辑上解决了语言被巫术化后公众如何去魅的道路。公众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有效地使用语言进行交往，能够就涉及一般公众利益的公共性问题，理性地进行信息和意见的传播与交流，运用交往理性对抗系统的工具—技术理性，最终获得解放利益。

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与发展

哈贝马斯在阿伦特之后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从社会历史分析的角度做出了更为全面和详尽的论述。在《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中，以17、18世纪的法国、英国和德国为例，具体描绘、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和发展，对“公众”及“公共领域”的不断变化、发展做出了分析。他认为，“公共领域”经历了由宫廷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向沙龙、咖啡馆、学者们的宴会、协会等“市民公共领域”变化的历程，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也逐渐由宫廷臣仆、城市贵族等上流社会人物，扩展到参与沙龙、咖啡馆、宴会、协会讨论一般问题的市民阶级。

哈贝马斯写道：“在17世纪的法国，公众指的是作为文学和艺术的接受者、消费者和批评者的读者、观众和听众。”^①这主要是指宫廷臣仆、城市贵族和小部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后来，室内沙龙逐渐取代了宫廷宴会厅，“18世纪沙龙的典型特征是，毫无经济生产能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城市贵族与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一般都是市民阶级出身）联合起来”^②，但“文人仍然无法摆脱贵族主人的控制而获得自律，无法将谈话变成批评，把美言变成论证”^③。直到“城市”把“宫廷”的文化功能承担过来，宫廷才失去在公共领域中的核心地位，沙龙则成为独特的“国中国”。在此时的沙龙里，“贵族、市民、亲王和伯爵的子弟和钟表匠、小商人的子弟相互交往……杰出人物不再为其庇护人效力，‘意见’不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18世纪没有一位杰出作家不是在这样的对话中、

① ② ③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载[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在向学者们所作的报告中，特别是在沙龙中首先将其基本思想表达出来的。沙龙似乎垄断了首发权：一部新作品，哪怕是音乐作品，都首先要在这个论坛上取得合法地位……它让人们看到，交流和争论如何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无关紧要的事情（去哪里旅游和怎样去）与重要的事情（戏剧和政治）一样受到认真对待而且穿插进行”。^①

英国的“咖啡馆”和法国的“沙龙”一样，成为批判的中心。“首先是文学批判中心，其次是政治批判中心，在批判过程中，一个介于贵族社会和市民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层开始形成了。”^②在这里，参与讨论/批判的公众圈子大大扩展了。“咖啡馆不仅向权威性的圈子开放，它还包括了更广泛的中间阶层，其中有手工业者和商人。”^③不管是律师们、市民们、牧师们、士兵们、辉格党政治家们，还是苏格兰人、法国人、赌徒们、艺人们、一流的智者……“每个职业，每个商业阶层，每个派别都有其钟爱的咖啡馆”^④。他们在咖啡馆里讨论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股票涨跌、保险金比率、法律问题、文学问题，批评最新戏剧，讨论大学里的流言蜚语，讲述议会或政府最新的麻烦。

在德国，起到公众理性地批判的机制则是17世纪学者们的宴会和古老的语言协会。尽管宴会、协会与沙龙、咖啡馆相比，影响要小得多，但其公众组成同样主要是王公贵族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没有等级歧视的前提下，实现了不同社会等级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和相互交往。

（二）公共领域的概念

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写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das oeffentliche Raesonnement），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的。”^⑤

1964年，哈贝马斯在为的一套百科全书写的一个词条中，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定义：“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

① ② ③ ④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载[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294页、第292页、第293页、第299页。

⑤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①

（三）公共领域的批判性

由于公共领域是公众在理性的基础上对一般性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讨论的地方，其内在地符合理性的要求，必然需要抵制一些非理性的权威和权力，无论是来自国家的权力，还是来自社会生产的影响。因此，理性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威领域是相对立的。公共权威领域主要指国家及其机构。当公众对国家的行政活动进行批判性讨论时，会形成公众舆论，直接和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②。

在公共领域中，哈贝马斯极为强调公众的批判性。哈贝马斯认为，古希腊城邦时代的自由民们，其直接民主的公共生活建立在面对面交谈/讨论的基础之上，对公共生活进行批判，形成了自由民共有的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雏形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贵族们在沙龙、咖啡馆中批评文学、艺术时形成的。当公众自然地由文学、艺术批评转到政治批评上来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才真正得以形成。

公众的批判性如何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呢？哈贝马斯通过艺术批评机制的分析提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批评者要明白自己有义务承担的双重使命，“既把自己看作是公众的代言人，同时又把自己当作公众的教育者”^③。第二，批判者只能以论证确立权威。“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较好的论证才能确立权威性，而且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一切服膺论证的人想法一致。与此同时，当他们作为专家反对‘教条’和‘流行’时，他们又可以反过来面对公众，要求对艺术所知不多者提高判断能力。”^④第三，批评者的批判意见仍只是私人的业余判断，并没有法官断案那样的权威。“艺术批评家仍有点像业余爱好者，他们的专业知识直

① 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载《传播学论坛》，<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Unid=944>。

②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③④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载[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到被反对时才有效。业余判断被集中起来，但并没有专业化，因而还是一个私人的判断，只对自身有效，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约束力。”^①第四，批判者必须让自己的意见到达广大的公众，“他们同时又必须得到整个公众的接受，而不应当局限于沙龙、咖啡馆和社团的狭小圈子里，即使在这些圈子的黄金时期也是如此”。^②第五，大众传媒是机制化的批评的工具。“作为机制化的艺术批评的工具，艺术和文化批评杂志是18世纪的杰出创举。”^③哈贝马斯在评述以大众传媒为工具的公共领域时认为，“仅仅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性理解，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甚至将自身理解为启蒙的现实过程”。^④公众阅读和讨论大众传媒上以理性为基础的讨论、批判性作品，就是“阅读和讨论自身”，是“公众映照自己”，是“通过将自己作为对象进入到‘文献’中”，有着“相互启蒙过程的永恒连续性”，是“自身已经成熟的个体的自我启蒙”。^⑤

（四）公共领域诸种机制的标准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沙龙、咖啡馆、宴会、协会等，虽然形式各异，“其公众的数量、构成、活动方式、讨论气氛以及主题的取向上有差异”^⑥，但其相同点都是“组织有意向的私人参加讨论”^⑦，在讨论的机制上有一些共同的标准。

首先，平等是公众展开讨论的基础。“所谓平等，按当时人们的理解就是指‘单纯作为人’的平等。”^⑧这种平等性标准“保护了一种社会交往方式，其前提不是社会地位平等，或者说，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这种趋势就是一种与平等相适应的社交取代等级礼仪”^⑨。

为什么公共领域机制的标准必须以平等为对话的基础呢？哈贝马斯论证道，“惟有在此基础上，论证权威才能反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权威，并最终实现这种平等”^⑩。在这种平等的对话、交流、批判中，私人构成公众，“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和威信，也意味着经济依赖关系在原则上不再具有影响力。市场规律和国家法律一样被中止”^⑪。也只有在平等地对参与公共性一般问题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公众观念才能机制化，进而成为一种客观要求”^⑫。

其次，公众讨论的前提应是“尚未被质疑的一般问题”^⑬。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迫切地需要“以信息作为其行为的理性定位”^⑭。但是，信息的解释权却被垄断了。向人们传输的信息在国家和一些利益集团的操纵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诸种机制》，载[英]奥克利·博依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第297页、第297页、第298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5页、第295页。